

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

乔治忠 刘文英

摘要:日本的古代史学是因中国传统史学的传入而产生的,中国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唐代,已有多种体裁的史籍传入日本,而日本选择了编年史作为其“国史”的编纂方式,公元720年修成的《日本书纪》在日本史学发展和政治文化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天皇朝廷、幕府、私家等不同的主体,都撰修了编年体史书。江户时代修成的《本朝通鉴》,是一部仿照《资治通鉴》的日本通史。《春秋》、《资治通鉴纲目》对日本的影响不止于史学领域,其中的“尊王”观念,成为推翻幕府、拥护明治天皇集权的舆论工具。考察中国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编年史;日本;官修;传统史学;求真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4)05-0077-10

日本的古代史学不是由本民族原发性产生的,而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在世界上,不是每个民族和地区都能够原发性地产生史学并且持续发展。自上古起,世界上仅形成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个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历史学,另一个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历史学。日本接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之后,也在本民族的史学发展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考察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间的联系和异同,对于中日史学史研究和中日政治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其中包含许多值得探索的学术问题。

一、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编年体史籍

考察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需要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发展以及编年体史的状况做概要了解。中国最早的史籍虽不是编年体形式,但编年体史籍在中国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居于特别显要的地位。

西周克商是中国上古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西周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以及诸多的政

作者简介: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刘文英,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300387。

权建设问题,开始思考国家兴亡的原因,得出“宜鉴于殷”、“殷鉴不远”的理念。^①“殷鉴”的历史观念是中国上古最早萌生的理性思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直接导致西周初期保存和整编官方文书,今存的《尚书》即来源于此。这种原始文书的编存,还不能视为史学的产生,只是一种早期的史学萌芽,为日后史学的产生准备了一定条件。因为从中国上古政治和文化的社会背景分析,官方连续地记载史事,标志中国史学的正式产生。但中国上古何时开始连续地记载史事,是一个难于寻求确证的问题。白寿彝先生根据《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谈到周宣王之事,推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于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②。对此,后文还将论及。

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籍是《春秋》,从中可以窥知早期编年纪事的方式。《春秋》纪事跨越240余年,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时间线索清晰,年、时、月、日俱全,体现了以时间顺序连续性记事的编年史特色。但内容极其简略,许多事件不明原委,赖战国时产生的《左氏春秋》(《左传》)才得以明晰。《左氏春秋》基本按照《春秋》的时间线索叙述历史,内容全面,真正成为记言、记事兼备的完整史籍,被视为解释《春秋》之作,是当时史学达到崭新水平的标志性成果。《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据说经过孔子的修订,而随着孔子的圣化,《春秋》成为儒学经典之一,历来作为中国古代史学贯彻伦理大义与经世精神的样板。当然,《春秋》内在的编年史性质,也常常被奉为编年体修史活动的一面旗帜。战国时期的《国语》等史籍,虽然也蕴含丰富的史料,但史学地位及社会影响均逊色于《春秋》和《左传》。

战国时还有另一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为魏国官修,藏于宫内,后随葬于魏襄王墓(一说为魏安釐王墓),世间再无传本,直至西晋时方因盗墓人挖掘而出土。此书记载从远古至战国魏襄王时史事,是编年体通史,资料宝贵,可惜在唐朝末年及五代战乱中佚失,仅在诸书引用中略存片断,虽可辑出,却已失原貌。

汉武帝时,司马迁以毕生精力编纂了130卷的《史记》,这是一部与先前史籍完全不同的纪传体通史。史书的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创造,其特点在于用分类的眼光看待历史事物和人物,设计出本纪、世家、书、表、列传等五种形式,分别而又相辅相成地叙述历史。这样可以全盘地处理历史素材,又比较机动灵活,不太受时间顺序的限制,例如战国时的屈原可以与汉代的贾谊合为一篇列传。但《史记》的本纪仍然具有历史叙述的编年体因素。东汉之初,班固仿照和变通了《史记》的体例,撰成《汉书》,创立由纪、表、志、传构成的纪传体断代史。纪传体断代史书中的“纪”,基本上就是简要的编年史。

东汉季年,荀悦撰写编年体断代史《汉纪》,编纂方法是依据《汉书》的“纪”而加以扩充,将《汉书》表、志、列传中的重要内容萃取出来,融入“纪”内,故书名为“汉纪”,可谓名副其实。此后,纪传体与编年体的断代史就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修史形式,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③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与纪传体史书均有大量编修,齐头并进,其间发生过纪传、编年何者为优的争议。东晋干宝“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④,即以编年体为正;而南朝

① 《诗经·大雅·文王》、《诗经·大雅·荡》。《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②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0页。

③ (唐)刘知幾:《史通》卷2《二体》,见(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④ (唐)刘知幾:《史通》卷2《二体》,见(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页。“丘明”,即旧说《左传》的作者;“子长”,司马迁字子长。

范晔则认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①。这个争论延至唐代,歧见迭出。但唐初朝廷偏重纪传体,唐朝不仅纂修了八部纪传体断代史,而且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将《史记》以下几乎所有的纪传体史书,^②都列为“正史”,编年体次于其后,称为“古史”,建立了以纪传体居于首要地位的史籍等级结构。

唐朝中期之后,也有不少史家致力于编年史的撰写,如唐穆宗时马总撰有《通历》,唐宣宗时姚康撰有《统史》等,均为编年体通史。唐玄宗时裴光庭欲著《续春秋经传》一书,甚至得到皇帝的嘉许,手诏赞扬:“今欲正人伦而美教化,因旧史而作《春秋》,斥班、马之纰缪,继经、传之褒贬,著述之美当如斯焉。”^③但这些撰述或未曾完成,或编纂不佳,都没有形成很大影响。编年史在唐代的一项显著发展,是唐太宗时为一朝皇帝纂修“实录”,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实录”成为极其重要的编年体史籍,象征着本朝官修当代史的最高级别,自唐至清历代相延,其他类别的官修史间或阙如,唯历朝皇帝实录的纂修从未废止。

宋代史学绚丽多彩,司马光以一部294卷的《资治通鉴》重振编年史声势。自其面世,赞誉如潮,仿作接踵,衍生出多种相关史著,例如宋徽宗时处士江贻撰《资治通鉴节要》30卷,乃删略司马光之书而成。南宋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北宋史事达980卷,仿司马光史料编排的“长编之法”而发挥之。编年史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向“简”与“繁”两个方向扩展,著述层出。其余解说、注释、补续、研讨《资治通鉴》之作很多,如南宋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严衍《资治通鉴补》、毕沅《续资治通鉴》等。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删略《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开创新意,与门徒赵师渊共撰《资治通鉴纲目》59卷,其体式大书为纲,分注为目,“纲仿《春秋》而参取群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至于大经大法,则一本于圣人之述作。使明君贤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④。这是一部讲求书法、义例,贯彻政治伦理和纲常准则,明正统、申道义的编年史,对后世的政治历史观与史学发展影响甚大。由南宋至清代,多有阐发、批注和接续之作,例如宋尹起莘撰《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元王幼学编《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刘友益撰《资治通鉴纲目书法》、明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清官修《明纪纲目》等,构成编年史籍的又一体系,史学地位、社会地位和影响已超越《资治通鉴》史籍系列。清乾隆年间纂成的《御批通鉴辑览》,为纲目体式的通史,纪事起自上古,止于明末,天头书有清高宗大量御批,全面评判历代史事,臧否人物,又重正统名分及臣下忠节,被乾隆朝君臣称为“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⑤，“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⑥。这意味着清政府已经将之置于所有通史与前代史之中的至尊地位，奉为历史

① 《隋书》卷58《魏澹传》引范晔语，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② 《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不仅列入《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纪传史，而且将晋代张莹的《后汉南记》、被时人多所诟病的王沉《魏书》、萧子显《晋史草》、隋牛弘的《周史》未成稿等等，一概归入。可见其标准唯据体例，而不论官、私纂修及质量水平，推重纪传史之意十分明显。

③ 《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 （宋）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圣祖御批本卷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88《御制评鉴闡要》提要。

⑥ 清高宗：《御批通鉴辑览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评论的圭臬。

中国传统史学的修史体例是多样的,纪传体、编年体之外,尚有纪事本末体,还有专记典章、专记人物、专作考证、专述地方地理以及专为史论等等内容的史籍,而且各成系列。然而纪传体、编年体始终居于最显要地位,二者各有所长。虽纪传体整体上占有“正史”名义,但编年体的《春秋》经传以及《资治通鉴纲目》系列史籍,标举名分大义、褒贬书法、尊王攘夷、大一统与正统论观念,与儒学的纲常伦理相配合,在史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重大影响,纪传体史书中少有可与匹敌者。编年史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对日本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以下对其进行探究。

二、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最初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已经难以确考。《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有对海上“倭”国的记载,而且常有使者往来,可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很早就具备了持续不断和逐渐积累的进程。据《日本书纪》记载,约公元391年,王仁从朝鲜半岛百济国到日本,传授各种儒学典籍。到6世纪,屡有中国南朝与百济的五经博士到达日本,经史之学应当已经在日本立足、发展。60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第一次遣隋使。两年后,历法之书传入日本,这是后来编纂编年史的必要条件之一。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以汉字书写,袭用《尚书》、《春秋左传》、《诗经》、《礼记》、《周易》、《管子》、《孟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文选》等典籍的词句与论断,同时融入了明显的佛教思想。^①620年,日本圣德太子等人又纂录《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②这是日本官方纂辑史书的首次尝试,虽其书久佚,而从名称的记载可以推知:这种分类别、有层次记述史事的方式,乃从中国纪传体史籍中得到启示。圣德太子等日本上层人物的这些活动,表明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跨越了被动地接受影响,而开始有意识地仿从和有目的、有规划地汲取。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一书叙述此事,称道圣德太子具有“文化立国的观念”,认为他的思想根据是儒教和佛教,“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东方思想体系,统一在圣德太子一人的人格中,构成了稀有的丰富智慧和深远的理性”^③。这个评论过度拔高了圣德太子的思想水平,并未讲出当时弘扬佛教与制定《宪法十七条》的背景与原因,但揭示出圣德太子“文化立国的观念”,对研究这段历史仍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韩昇认为:圣德太子执政之时,需要理顺与权臣苏我马子的关系,苏我马子曾经暗杀崇峻天皇而拥立现任的推古天皇,专横跋扈,气焰熏天。圣德太子谋求加强皇权,“只能采取妥协作法,暗中扩张势力,逐步造成皇权至上之势。……采取苏我氏正热衷推行的佛教形式,可谓上策”^④。这

① [日]大庭修:《汉籍输入の文化史》,山本书店研文出版(东京),1997年;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② [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安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作者认为“国记”是记载国家之史事,臣、连是日本中央政权中有势力的氏族,伴造是世代掌握朝廷某种事务的中等氏族;“百八十”表示众多,并非确数,“部”为伴造的同族;“公民”指直属于中央朝廷的人们。此书意欲记述上自天皇、下至国民的历史,是否撰成,学界看法不一,内容久已无存。

③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6页。

④ 韩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本圣德太子写经与东亚的“佛教外交”》,《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第一次指出了圣德太子与苏我氏实际上处于博弈状态,但作者强调圣德太子对佛教的利用,而忽略他以儒学实施教化的宗旨。

苏我氏势力强悍,圣德太子并无实力与之对抗,这不能不说是皇权的危机。圣德太子与苏我氏皆崇信佛教,弘扬佛法显示了二人的合作,起到缓冲与掩护作用。但佛教并不具备强化皇权的理论基础,真正能够运用的是来自中国的儒学思想。《宪法十七条》内虽然也有佛学的话语,但核心是儒学的政治伦理,目的在于宣扬皇权不可冒犯。例如第三条:“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方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致坏耳。”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十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①思想之儒学特征,语句之模仿中国典籍,都十分明显。《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的编辑,也昭示天皇高高在上以及下属的等级身份制度,等级身份制同样起到维护皇权的效用。应当明确,无论《宪法十七条》还是《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一种官方教谕,试图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圣德太子希望以此争取人心,树立起拥护天皇集权的理念,引导社会意识,这正是所谓“文化立国”的真谛。但其效果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需要持续长久的努力,更需要与现实的世态民情密切结合。

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死后,日本政局又经历了几番动荡,还发生了内乱外战。在中国大陆,唐朝取代了隋朝,政治体制和文化发展渐进到新的繁荣局面,对日本的影响力也空前加大。在朝鲜半岛,新罗与百济之间开始了兼并战争,新罗联合唐朝,百济亲近日本。663年,唐朝与日本、百济的联军在白江村激战,日军遭受惨败,百济随之灭亡。此事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多方面刺激,而是否全面坚持仿从唐朝的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主线。在权力纷争、律令制定、经济调整的背后,官方较为平稳的史学建设,是对日本社会发展起到最坚韧、最稳固、最特别也是最长远影响的因素。这种重要的史学活动发生于日本大和政权的奈良时代(701~794),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深刻影响。

712年,元明天皇令安万侣承接此前修史工作,纂成《古事记》3卷,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史籍。该书叙述历代天皇事迹,略具先后次序,但缺乏确切的年代记述,叙事的各个条目详略不一,有的仅一行文字,类若笔记杂录。但其特点是构建了天皇为神之后裔的说法,也排列了各代天皇的世系,在制造天皇独尊的舆论上前进了一步,是向成熟史书编纂的一个过渡。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舍人亲王奉敕撰)30卷,才是一部正式成熟的史籍,在日本政治文化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全书基本是正规的编年体,以汉文书写,纪年历法源自中国,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地仿从中国编年史的撰著方法,但也做了一些机动灵活的调整。《日本书纪》纂修之际,正值中国唐代,中国传统史学已相当成熟,日本现成地接受中国长足发展的史学成就,修史方式可以做充分的选择。如前所述,唐朝特别尊崇纪传史,然而日本纂修本国历史,则选取了编年体。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书纪》仿照中国《汉纪》、《后汉纪》等编年体史书,也汲取了《汉书》等的“本纪”,即以一代皇帝为单元的分卷作法,故名曰“书纪”。^②这种解释很有道理,但纪传体的本纪也是编年体,前3卷的神代部分才是编年之外的灵活处理,

① 以上见《日本书纪》卷23,吉川弘文馆,1989年,第142~146页。推古天皇十二年四月载《宪法十七条》原文。

② 参见[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安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因为关于神代的故事,不适宜编排的纪年,于是仍用类若《古事记》的叙事形式。

第二,除神代史,《日本书纪》排列从神武天皇到第41代持统天皇的正统世系,并且详叙其事,每届天皇都有言之凿凿的纪年年数。但实际上,这些纪年大都是人为编排的,如第一代神武天皇是根据中国的讖纬学说,以“辛酉革命”说出发,从推古天皇九年(辛酉)上推21个甲子编造而成,大大延长了历史纪年,造成以下的天皇纪年都掺入水分。稍有实据的纪年应当是从6世纪初的继体天皇开始。^①修史者编排这样系统的纪年,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它显示了天皇正统传承的系谱,悠久的历史 and 年代周详,自然而然给人以敬畏、可信的印象。对于不能编年的神代史,则反复地采取标明“一书曰”、又“一书曰”的方式,罗列多项传说,似乎很忠于原始资料。但这些罗列只有细节上的出入,实质并无区别,目的也是要博得臣民相信。实际上,日本当时不会有这“一书”又“一书”的许多典籍,而刚刚修成几年的《古事记》却未见引用,原因是《日本书纪》所构建的神代系统与《古史记》不同。

第三,该书通过塑造七世的神代史和所谓天孙降临的故事,而转换为入代历史,直接申明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具有不同于凡人的神的品格,至尊地位无可替代。天皇永远占据正统统治者的名位,哪怕大权旁落,神格的天皇地位也不能被他人取代,这是一种极端的皇权血统论观念。中国传入的儒学纲常伦理,《春秋》学的大义、名分观念,帝王正统论历史思想等,都在天皇神格的塑造中得到无限强化,从而否定了政权鼎革的合理性。《日本书纪》的这一主导思想,借助于日本尚存以血缘纽带联结的社会关系,依托于圆满的历史叙述体系,较为容易地征服人心,给早期日本的各个阶层植入浓重的政治血统观念,致使在名分、大义上,形成不可触动天皇的思维定式,而且很难产生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这是日本天皇能够实现“万世一系”的主要原因,它其实是来源于中国史学理念并被稍作改造,改造的关键是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②的历史观念,变成“皇天有亲,神格至上”——天皇就是最高神的嫡亲后裔。

总而言之,《日本书纪》的编纂是十分政治功利主义的举措。日本史家津田左右吉^③早就指出:《日本书纪》的神话并非民间自发产生与发展,而是有意的编纂,其主题出于实现政治统一的构想,以加强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④该书之所以选择编年体撰修方式,一是这种体例较好掌握,二是宜于构建天皇为核心的历史体系;其编纂意旨远承圣德太子的理念,但较之《宪法十七条》的空洞说教、《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的粗糙记述,高明与成熟的程度已经天差地别,这个进步得益于对中国汉唐之际史学文化的深入领会。

有《日本书纪》开先,日本朝廷陆续纂修了《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五部史书,与《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体例大体一致,皆为按各代天皇分卷的编年史,编年体已经成为日本官方纂修国史的主要形式,而中国兴盛的纪传史,在日本修史

① 日本幕末史学家伴信友(《日本纪年历考》)对此做出过考证。明治时期的史学家那珂通世发表《上古年代考》,认为《日本书纪》的纪年依照讖纬说法做出人为的编排与延长,至少虚构了600多年的历史。上述日人论文,见辻善之助编:《日本纪年论纂》,东海书房,1947年。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309页。

③ 津田左右吉(1873~1961)于二战之前即剖析了日本“神代史”的本质,指出其完全是因应政治需要的构想,因此受到压制,险被逮捕。日本战败后,得到学界推重,1949年获最高级别的日本文化勋章,其史学思想成为主流。津田左右吉著述宏富,有全集行世。

④ 《津田左右吉全集》别卷第一,《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岩波书店(东京),1966年,第42页。

活动中长期受到冷落。自《续日本纪》始,每值高官、贵族逝世之时,附记其人生平事迹。日本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取纪传体的传记部分加入编年体,丰富了记事的内容,弥补编年体的局限……可谓令其史体得到了进展”^①。意思是说日本发展了编年史的写作方法。这是对中国史学不甚了解造成的误说,其实唐、宋实录都在重要人物卒年加入其人简要传记,《续日本纪》以后的几种史书不过是仿效唐朝纂修的实录而已。在唐代,实录是公开发布的史籍,日本遣唐使很容易看到并且获得。日本编年史从仿照《汉纪》等书转而仿照唐代实录,是在接受中国编年史的影响中有所趋新。

“六国史”完成之后,因政局不稳,地方动荡,天皇势力式微,以朝廷名义的修史活动显著衰退,但此后仍撰成17卷的简略编年史《百炼抄》。日本的官方修史不止天皇,掌权的“武家”、幕府,都可以成为修史的主体,此外也有不少私家修史,他们的编年史撰述络绎不绝。例如不明作者的《日本纪略》,由藤原通宪纂修的《本朝世纪》,僧人皇圆编纂的《扶桑略记》等,都是有影响的编年史。镰仓幕府时纂修的《吾妻镜》一书,是又一编年体历史名著,全书52卷,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180~1266年前后与幕府将军相关的历史。在日本还出现一种历史故事类书籍,史事与文学渲染纠合在一起,撰者多为私家。这种撰述实际也融入编年叙事的方法和结构,例如著名的《荣华物语》即具有明晰的编年特征。由此可见,编年史的撰写已经扩展到日本官方与私家的各个阶层,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

《资治通鉴》这部重要的编年史何时传入日本,尚难确考,因为北宋严格限制图书外传。但它至迟到南宋时期已流布于日本,因为在镰仓幕府时期即已成为天皇和幕府的经常阅读之书,后醍醐天皇(1321年即位)曾经将其作为经筵进讲之书。^②至江户时代,《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都成为倍受关注的重要史籍,德川幕府及宫廷均将之用于讲习,而学者之中,研习、讲论,蔚成风气,史学影响和思想影响颇为显著。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经济与文化都获得较大发展,修史事业也繁荣发达。幕府官修和幕府所指令学官纂修的史籍,大部分为编年体,如《武德大成记》、《东武实录》、《武德编年集成》、《德川实纪》、《续德川实纪》、《后鉴》等。这些史籍融会了对多种中国编年史体式的理解,稍作变通,除加入一些综述、附录之外,主干均为编年记述。这一时期,编年史最重要的著述是“大学头”林罗山父子编纂的《本朝通鉴》。

林罗山(1583~1657),名信胜,号罗山,又称道春。在德川幕府初期的学术文化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因而林家世任“大学头”,相当于首席学官。他崇信朱子学说,对中国儒学和程朱理学多有研究,撰著丰富。在史学上,对《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甚为推重,曾写诗赞扬《资治通鉴纲目》:“紫阳通鉴笔纯精,教使君臣必正名。历代一纲张目万,盛衰治乱眼分明。”^③

林罗山在完成多种幕府的修史项目之后,开始编纂一部编年体日本通史,生前撰成40卷,记叙了自开国神武天皇到宇多天皇的历史,题名“本朝编年录”。他逝世后,幕府将军命其子林恕继续编纂,定书名为《本朝通鉴》。在官方的大力扶助下,林恕率领儿子、门生用6年的时间修成全书,即《本朝通鉴》40卷,署名仍为林罗山。《续本朝通鉴》230卷,记史下限止于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六年(1611),外加前编3卷,叙述神代故事,又有提要30卷、附录5卷、卷首2卷。其书《凡例》称:“每岁某年上,横书干支,仿朱子《纲目》

① [日]坂本太郎:《六国史について》,见东京大学史学会编:《本邦史学史论丛》上卷,精兴社(东京),1939年,第130页。

② 参见李春光:《〈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日]中山久四郎:《朱子の史学特に其の资治通鉴綱目につきて》,《读史广记》,章华社(东京),1933年。

例。而记事之法,聊摸温公《治鉴》之体。”这意味着该书主干仿照《资治通鉴》编年叙事,但也汲取了《资治通鉴纲目》的因素,这不仅仅是每年首书干支纪年,正文内容也间有纲、目样式的编写风格。例如卷5孝德天皇大化三年十二月,正文有“制七色十三阶之冠”,其下低一格书写一段文字,解说官冠具体的分色、分阶情况;卷9文武天皇大宝三年正月有“定大射禄法”正文,其下低一格书写一段文字,讲解这种规制。这样的实例尚有很多,都类似于有纲有目、互相配合的方法。《续本朝通鉴》将这一特点发挥推广,常常以低一格的详细文字,补充内容和考述史籍的不同记载,类似解“纲”之“目”。但该书没有史论,这不同于《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探寻其故,应是林氏父子以私家肩负官书纂修,意存谨慎,只直书史事,不作议论。林家崇尚朱子,编纂此书不用纲目体,大概也是要免于担当以书法定褒贬、发议论辨是非的责任。

《资治通鉴纲目》这部编年史对日本的主要影响,已经不限于修史体例方面,而是与整个朱子学说结合,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观念功效。江户时代水户藩的学术异军突起,比其他学者更为严格地讲求《春秋》大义、《纲目》大法。1657年,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正式开办史局,启动纪传体通史《大日本史》的纂修。此书规模庞大,纂修艰难,几经起伏,至1897年基本修成,1906年方全部印行,前后历时250年。全书纪、表、志、传共397卷,另目录5卷,是日本惟一部体例完备的纪传体通史。该书虽为纪传体,但十分讲求《春秋》大义、纲常名分,执意将早期的神功女皇写入《后妃传》,在日本南北朝历史上坚决主张以南朝为正统,宣称这些都是贯彻了《春秋》精神、《纲目》准则,甚至仿照《资治通鉴纲目》的书法,为被流放的后醍醐天皇在相应的年份特别书写:“天皇在隐岐”,如《资治通鉴纲目》“帝在房州”之例。^①高唱“尊王”的水户学派,后来成为倒幕运动的舆论制造者,其思想根据,就是包括《资治通鉴纲目》历史观点在内的朱子学说。日本接受中国古代编年史的影响,不限于史学领域,前有《日本书纪》的编纂,后有《资治通鉴纲目》精神的发扬,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德川幕府垮台之后,明治天皇亲掌大权,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同时,继续实行“王政复古”,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下令纂修《大日本编年史》。明治二年(1869)天皇颁诏书曰:“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但自《三代实录》以后,绝而未续,岂非一大缺憾!今已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欲继祖宗之余绪,广施文教于天下。任总裁之职,须素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②语意中隐含着贬抑德川幕府纂修的《本朝通鉴》和水户藩编撰的《大日本史》,欲以天皇主持纂修的通史凌驾其上,占据最高的正史地位。当然,他属意的仍然是编年体,此中似有《日本书纪》和“六国史”的情结。在拟议的《大日本编年史》中,决不舍弃《日本书纪》构建的神代史,因为天皇政权正在整合日本的神道思想,推行鼓吹天皇神格的“国家神道”观念。然而时代已经不同,整个日本国充满了锐意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氛围。在史学上,清朝历史考据学的影响和德国兰克史学的输入,孕育了强烈的治史求真的理念,弥补了日本旧史学的先天不足。担任首席纂修官的史学家重野安绎和纂修成员久米邦武,受考据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著文揭发国家神道的老底,考订日本古史记述的种种失实,终于导致笔祸,久米邦武被罢免,重野安绎辞职。但是,日本的国家修史活动也难以继,因为无法回避学者所揭出的年代伪造、旧史失

① 唐武则天将其子唐中宗废除帝位,放逐房州。《资治通鉴纲目》连续13年于每年正月开篇即书写“帝在均州”(1次)、“帝在房州”(12次),直至返回京城。此被称为以史笔书法申明大义的典型示范。

② 转引自[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安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真的问题,官方史学寿终正寝,只进行史料的整理以供学界研讨。不过,私家著述仍络绎不绝,如马杉繁《国史纲鉴》30卷,是以“纲目”体例编纂的通史,铃木贞治郎《江户政记》、三尾重定《新撰日本政记》等,都是标准的编年史,连重野安绎也撰修了编年体《大日本维新史》。编年史这种古老的中国史体传入日本之后,即使在百事更张、体制西化的维新背景下,仍相当长时间地维持了活力。

三、学术启示

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和相互影响,不能仅停留在现象的罗列和堆积上,应当进而探讨其学术启示,加深对于史学史、史学理论的认识。中国传统的编年史传入日本并且产生很大影响,可以启发我们做出哪些学术思考呢?这里暂且列述三点,谨此抛砖引玉。

第一,日本将编年体修史方式作为首要接受的对象,从中可深入思考中国史书体裁的多样化问题。编年史是中国最早的修史体裁,其线索简明,把握时间顺序即可成形,切合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状态。日本在面对中国多种史书体例传入的情况下,选择编年体修史,是因为便于掌握,这在上文已经提到。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多样的史书体例?这是因为中国的原发性史学包含求真知、求广知的因素。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和互为制约中,私家创新撰史体例,是在官方制约下达到真知、广知的一条途径。纪传体史书可以容纳较为规范的史事内容,分类记述也便于读者深化理解,司马迁就是在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求中创立了纪传体。典制史、纪事本末体等史书,也是在试图深入认识某种历史事物或便于认知历史状况的实际需要中催化产生的。纪传体通史的编纂十分艰难,中国古代实际只产生《史记》这部成功之作,而纪传体断代史较适合中国古代反复改朝换代的状况。日本早期,没有按纪传归类方式组织史料的编纂能力;确立天皇“万世一系”政治体制后,断代纪传史不大适宜采用。至江户时代,终于开始编纂一部纪传体通史,这其中还不无水户藩有与幕府大学头林家史学相竞争的闹意气因素。^①即使有此一书,也不能动摇日本编年史占据的主导地位。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还出现过几种纪传史,^②但其影响微不足道。

其实,即使在中国,纪传史也不是必然居于编年史之上,其所以会成为“正史”,是唐朝官方所酿成。唐朝起源于北方,唐初修史如果采用编年体,必然会面临南北朝时采用南朝还是北朝年号的问题。于是统治者倾向于纪传体,北齐、北周、梁、陈等各成一书,皆立本纪,淡化了并立政权孰为“正统”的问题,如此导致对纪传史的抬高,取得了正史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有时也会因特殊情况偶然地形成无法逆转的趋向。

第二,原发性史学产生的条件之一,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较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并且此种理念得以立足于社会,历史学才能真正破土萌发,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③。一些民族和地区,不能原发性地产生史学,可以次生地接受传入的史学,但次生、传入的史学不仅需要做出适合新环境的改造,而且往往有先天的缺陷,这是原发史学与次生史学的不同。日本最初接

① 参见[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安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② 参见周斌:《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综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乔治忠:《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受中国的传统史学,出于功利性宗旨,《日本书纪》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其先天缺陷是记事求真的意识相当淡薄。缺乏坚韧的记事求真意识,移植而来的史学也容易枯萎,日本的史学发展也确实有过间断,有过《荣华物语》之类杂糅文学想象的记史作品,这都可能导致史学的异化和消解。不过,日本史学是靠中国源源不断引进史籍来维持,直至自身逐渐成熟。日本史学真正具备可以独立、内在地发展,应迟至江户时代,这时受中国传统考据学影响,开始具有求真考实的理念,也有了对历史观念的独立思考。中外史学交流上的这一问题,值得延伸考察和认真研究。

第三,《日本书纪》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公然编排不确实的历史纪年,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于中国古代,中国的上古纪年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编排,通过对日本早期史学的研讨,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的历法,记日方法和记月方法产生很早,也比较完善,唯独纪年方法十分模糊,至西汉初年也没有多大改善。从现存殷商、西周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来看,长期沿用“唯王”若干年(祀)的纪年方式,而对于在位君王又缺乏明确的称谓。^①今存铜器铭文即使有纪年,但所属哪一君王,仍然不易判断,这反映出纪年方法的严重缺陷。在这种纪年方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必须形成连续的记事文籍,“唯王”而不明哪一君王的缺憾才可以得到弥补,而连续的、有年数的记事就是编年体史籍的诞生。根据《史记》,中国久已公认的确切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的共和行政。所谓共和行政,是周厉王被国人暴动所驱逐,暂由共伯和执政。据顾颉刚、徐中舒等考订,共伯和就是很有历史意识的卫武公。^②凭卫武公的政治眼光,不难确知共和行政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有必要记录时政,以备将来查验,免遭谴责与祸患。因此可以推断:共和行政开始了按时间先后连续性的记载史事,从而也有了确切的纪年;中国上古史学的产生与准确纪年的起始,是同时的、一致的事件。此前没有连续性的记史活动,也就不会有准确的纪年。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纪年远始于夏代,应当是很不可靠的。有人指责夏商周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竹书纪年》的年代体系是个败笔,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断代工程固然问题甚多,但不采用《竹书纪年》的说法,不是过错。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③由此可知,司马迁见过不同编排体系的上古纪年,“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而且互相“乖异”,无法考信,最终还是采用从共和行政开始的准确纪年。因此,《竹书纪年》的纪年系统不过是战国时期多种编排的一种,其共和行政之前的年数可供参考,但不可贸然据信。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对东亚各国的影响,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对东亚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史学的比较,经过认真探索,定将会深化对史学发展史的认识,从而再创学术新境。这项研究任务十分艰巨,当前还只是刚刚起步,极望历史学界才俊特别关注和踊跃投入。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 西周君王有谥号,如“成王”、“康王”、“昭王”等,应为死后所加。史学界有人认为早期这些王号可以“生称”。但从纪年中从未出现在位周王的称号来看,“生称”之说难以成立。

②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203页;《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中华书局,1998年,第1005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488页。